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13位ISBN编号:9787807136927

10位ISBN编号:7807136928

出版时间:2008-6

出版时间:山东画报出版社

作者:冯克力 主编

页数:173

字数:100000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内容概要

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,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。

令人遗憾的是,在叙述历史的时候,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,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 片的书籍里,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,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。

《老照片》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,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,让照片自己来诉说。

有时候,照片蕴含的话语、传播的意味,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,而历史却只有正视 和倾听照片的话语,才能鲜活生动起来。

本书借助于老照片,真实生动地回顾了中国几段现代历史,如:为"中央文革"做记者的日子,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,下放东北的日子,再看北京老照片、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等等。 有着老照片做佐证,大大增强了该书历史的可靠性。

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作者简介

冯克力,1954年生于济南,服过兵役,做过工,后供职山东画报出版社,1996年起受命编辑创办《老照片》,任执行主编。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书籍目录

邢文举 为"中央文革"做记者的日子(上) 一位普通的部队宣传干事,被临时调任"中央文革记者"后的非凡经历张光渝 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身为富家子弟、范筑先女婿的张维翰坎坷而传奇的人生道路王炳毅 杨西光的家世和经历胡剑杨 森与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范 泓 金融实业家束云章其人与事刘汉忠 张发奎片影郑广江 辗转白山黑水间苏仲湘 下放东北的日子 在饥肠辘辘中,依然保持昂扬的"政治"斗志,构成了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冯印谱 一张毕业合影朱新地 童年的风景黄正德 我的画友同学胡大进 父亲张祚臣 伯父的故事史耀增 充满忧郁的眼睛 照片上那双忧郁的眼睛,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章开元 再看北京老照片 昔日的北京城,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而驻足徐宗懋 《镇江沦陷记》之影像版陈希贤 时隔五天的两张照片刘巍峰 刘公岛上的石碾冯克力 《中国》,中国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章节摘录

为"中央文革"做记者的日子(上)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"文革"初期,我从沈阳军区借调北京,当了十六个月的"中央文革"记者。

我以《解放军报》记者身份,先后在南京、上海目睹并参与了"文化大革命"的一些活动。

总政的借调通知1933年2月,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,1950年11月,从学校参军参加抗美援朝,1953年4月,在朝鲜火线入党。

1965年,我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,被抽调参加社教工作团,在黑龙江通河 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。

1966年9月, "文化大革命"风起云涌,社教运动告一段落,我返回原单位。

回到仓库, 政委南荫堂告诉我, 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, 通知借调我到北京总政工作。

南政委不愿让我走,给沈阳军区后勤部朱士焕政委打了电话,受到朱士焕的批评。

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我们仓库,找我谈话说,组织调你到北京去,工作非常重要,你一定要好好表现,现在正进行"文化大革命",是组织考验你的时候,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。

说实话,听说要借调总政,我深感受宠若惊。

我当然无法料到,此行虽然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,却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。

名义上的"钦差大臣"1966年9月9日,我从沈阳乘火车到北京,除我们沈阳军区三十多人外,还有来自北京、济南、广州军区的同志,共约二百人。

人员到齐后,便召开了会议,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讲话说,中央调部队同志参加"文化大革命",到新成立的"中央文革"做记者工作。

接着,"中央文革"成员王力讲话,那时的王力,是颗正在上升的"新星",不少人以能见到他、聆听他讲话感到荣耀。

王力说,调你们到"中央文革"工作,任务是到各地观察"文化大革命"情况,你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,紧跟"中央文革",把"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"进行到底!

领导讲话后,"中央文革记者站"负责人徐学增说,我们是"中央文革记者",到各地是以《解放军报》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,主要任务是观察"文化大革命",反映各地情况,向"中央文革"报告,站不站在造反派一边,是立场问题,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。

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,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,为人忠厚老实,对组织一向忠诚。

后来他被整得相当厉害,曾和我一起被关在"中央文革"的"小号"。

" 中央文革记者站 " 为我们照相、办证,我们就算是《解放军报》记者了,但实际是为 " 中央文革 " 提供报告情况。

办公地点设在北京花园村。

后来又增加了一批人,他们的身份是《红旗》杂志的记者。

陈伯达、江青、康生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,曾多次接见我们。

看大字报被扣留集训和学习结束,沈阳军区205医院政委禹福春、23军某部教导员郑钧亭和我三人被分配去江苏省,住南京军区。

禹福春是医院政委,被指定为"中央文革"南京记者站负责人。

我们的火车是早上到的南京,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我们。

令我感到吃惊的是,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我们,并亲自陪同我们,下榻饭店四楼的高级房间

杜平是我们的老首长,在朝鲜,他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;在沈阳,他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。

华东饭店被南京人称为"AB大楼",据说过去是美国顾问团的房子,后被南京军区用来接待高级干部

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套房里,外面有会客厅,安装了红机子保密电话,可直接和"中央文革记者站"通话,也可和中央一号台通话。

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,给我们配备了车辆,随叫随到。

Page 5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,每人每天交六角钱,每餐四个菜,不足部分,由南京军区补贴。

当天晚上吃过饭后,我们三人就来到南京市委看大字报。

我们刚到南京,只有南京军区许世友、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,江苏省委对我们的身份一无所知。

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,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"文革"。

因此,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,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。

我们无法向他解释,只能告诉他,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、杜平政委。

后来我们得知,他们得到的回复是: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,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。

经过"导演"的常委会早在我们这些"记者"到各地前,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党委都收到了"中央文革"的通知,今后,将有"中央文革记者"列席党委常委会。

到达南京第二天,禹福春让我联系列席省委常委会。

我用红机子直接要省委办公室,接电话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书长。

听得出来,他们已接到通知,并不感到突然,还代表省委领导,对我们表示欢迎,希望我们今后多帮助、多指导。

后来听江苏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长高啸平说,在我打电话给姚秘书长后,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湖 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通报"中央文革记者"要参加省委常委会。

张平化说,他们也得到了通知。

高啸平后来向我泄露了 " 天机 " ,原来,省委要记者列席的常委会,事先都经过 " 导演 " ,是专门 " 表演 " 给我们看的。

现在的我,当然能理解江苏省委的做法,但在当时,我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,提高"革命警惕" ,力争了解真实情况。

高啸平日后被康生点名为"派性黑手",本想紧跟"中央文革",却被"中央文革"打成"黑手"。 看来,官场上的得失沉浮实在难以预料。

禹福春是我们的负责人,省委常委会由他列席参加。

不久,他被调回部队,便由郑钧亭和我轮流列席。

时间长了,我们的知名度逐渐高起来,不仅江渭清等人对我们客客气气,就连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头 头也对我们另眼看待。

乘"子爵号"专机1966年底,"中央文革记者站"通知各地记者返回北京,参加集训和整风。

此时,南京发生了"一·三事件"。

"红总"头头提出要脱产闹革命,动员一批工人和群众,到浦口堵截火车赴京见毛主席,有的还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到各地闹革命。

中央命令南京军区部队紧急出动,将这些人接到江苏饭店,要求他们"就地闹革命"。

但是 , " 红总 " 部分群众对南京军区强烈不满 , 在少数人的挑动下 , 把江苏饭店砸了。

社会上纷纷传闻,解放军与工人、群众间发生流血事件,形势一时严峻起来。

1967年元旦前后,中央在开会解决陶铸问题。

听说南京发生"一·三事件",周总理派"子爵号"专机送江苏省委领导火速返回南京。

郑钧亭和我同机回南京,参与调查和处理这起"流血事件"。

当天早上,我们赶到机场,机舱内总共只有四人: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、许家屯和我们两名记者

我和许家屯熟悉,许家屯在南京,经常代表江渭清出面应对造反派。

一次他被学生围困,我曾到场帮助解围。

回到南京,我立即找到"红总",有人激动地对我说,"一·三事件"十分严重,已死了许多人了, 这是阶级敌人向革命造反派报复,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!

然而,凡造反派说有死人的地方,我一一走遍,却没发现一件死人的证据。

得知我们回到南京,江渭清专程来到华东饭店,说:"邢记者啊,请你帮帮忙吧,一定要调查仔细,如实向中央报告啊……"我说:"据我调查,'一·三事件'一个人也没死,请江书记放心,我们会妥善处理。

"江渭清听了我的话,似乎松了一口气。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不久,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见到我说:"你说,那么多人不生产、不干活,非要进京闹什么革命, 我们不出动军队,行吗?

"许世友对"文革"不满,而且毫不隐讳,但不管怎样,许司令在大家眼里,绝对是忠于毛主席和受党中央信任的战将。

"一、二六"夺权风暴1967年初,上海"一月风暴"吹向全国各地。

在上海、山西夺权后不久,江苏省造反派多次开会,准备效仿上海、山西,夺江苏省委的权。

" 夺权 " 前,我从梁辑卿那得到确切消息,知道夺权行动的时间。

按当时口径,党中央要求夺权地区,一定要实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"大联合",新生政权一定要"三结合",必须有领导干部、革命群众、军队的代表。

然而,据我所知,这次夺权主要由"红总"一方组织,他们将江苏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排斥在外。

一次,他们邀请我参加研究夺权的会议,我看到,造反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夺权日期、夺权形式以及 夺权后如何发表公告、如何让中央承认等问题上,对如何实现大联合、抓革命促生产、稳定江苏局势 等不感兴趣。

对此我保留自己看法。

1月26日深夜, "夺权派"开始行动。

造反派要求南京军区出动一个营的兵力,保护他们的夺权行动。

南京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后,派出兵力保护了夺权行动。

于是,这成了"夺权派"的一大政治资本。

" 夺权派 " 将江苏省委十三级以上干部全部押到一个大房间,查封了省委、省政府有关部门,将公章 收罗起来,装在一个大袋子里。

第二天,南京街头出现铺天盖地的标语、漫画、大字报,两派尖锐对立。

" 夺权派 " 说 , " 一二六夺权 " 好得很!

被称为 " 好派 " ;没有参与夺权的 " 八二七 " 和 " 东方红 " 说 , " 一二六夺权 " 好个屁! 于是被称为 " 屁派 " 。

平时我对"八二七"有好感,但是我也参加过"夺权"会议,因此,这两派都说我是他们的支持者。 周总理的批评1967年2月中旬,江苏"夺权派"组织"汇报团",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,以求得认可和支持。

"汇报团"到达北京后住在西苑旅社。

他们在向周总理和"中央文革"汇报时,说他们的情况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邢文举知道。

几乎与此同时,"八二七"等组成的"告状团"也来到北京,住在煤炭部招待所。

他们在汇报情况时,也说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邢文举了解他们的情况。

听说我对这两派的情况都知道,总理当即指示,让《解放军报》邢文举马上进京汇报。

很快,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给我说,刚刚接到周总理通知,要你立即赶到北京,不得有误,已经安排军区的"伊尔14"飞机,明天上午保证赶到。

我记得很清楚,那架"伊尔14"上就我一个乘客。

那天气象条件不好,飞到济南上空,气流造成飞机剧烈颠簸。

上午9时许,飞机在北京降落,有人安排我住在西苑旅社。

"夺权派"的"汇报团"看到我专程从南京赶来,以为我肯定是支持他们夺权。

住下后 , " 中央文革记者站 " 通知我 ,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接见我 ,当面听取江苏省的情况汇报。 我按时赶到谭震林住处 ,那是中南海的一处四合院 ,大屋檐 ,画栋雕梁 ,古色古香 ,但光线很暗 ,感 觉黑乎乎的。

我说,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不成熟。

夺权的一派不让" 八二七 " 等革命造反派参加 , 所谓夺权实际就是抢公章。

接着,据我所见所闻,汇报了江苏省夺权的前前后后。

我的结论是,这次夺权既没有"大联合",也没有"三结合",不符合中央对夺权的要求。

谭震林听了,跺着脚说道:"这是什么夺权!

这是什么夺权!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你赶快把刚才说的情况,写个材料上报周总理。

"于是,我按照他的要求,写了份简要报告。

晚上,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江苏省领导。

我先在另一个房间等候,夜里十点多,女服务员送来一盘小包子,我边吃边等,心里很紧张。

毕竟,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周总理召见。

不一会儿,服务员来到我房间,说周总理让我马上到江苏厅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,总理一看我进来,立即从沙发上起身,健步上前足足有五六步,没等我敬礼的手放下来,便紧紧地和我热情握手。

我的两眼禁不住立刻湿润了。

我见过许多首长,遇到类似情况,首长对下属的态度不大相同。

下属进门敬礼,有的首长站起来握手,有的首长坐着握手,有的首长点头示意。

有的无动于衷,望你一眼就算看得起你了,"中央文革"就有这样的人。

相比之下,周总理对我这样一名普通干部给予的礼遇,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?

回忆至此,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我们坐下后,周总理拿着我写的报告,对旁边的江苏省领导们说道:"你们说,这叫什么夺权!

怎么能这样搞派性呢?

要搞好'大联合',搞好'三结合'嘛!

"说着,他用力跺着脚。

接着,周总理对江苏省领导说,我们和少奇同志共事多年,毛主席说他错了,我们就站在毛主席一边嘛,他有什么错误,我们按主席指示,批评他的错误嘛。

你们是党的高级干部,怎么能这么做?

怎么能支持一派,反对一派!

你们知道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多大损失吗?

说着,周总理又坐在沙发上跺起脚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周总理与江苏省领导谈话时,至少五六次跺脚。

批评过后,周总理又嘱咐他们说,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次夺权教训,回去以后,把江苏省的问题解决好

江苏省领导离开后,周总理将我留下,就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,——仔细询问。

周总理的这次接见,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两点多才结束。

临别时,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来自哪个单位,多大年纪,有什么经历,我一一回答。

此情此景虽已过去四十多年,仍历历在目。

受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召见第二天,谭震林副总理第二次召见我,地点还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。

谭副总理问我,你们看,下一步,让江渭清出来工作可不可以?

江苏的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能不能通过?

对谭副总理的问话,我有些茫然,我第一次遇到中央首长向记者征求人事问题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 这可能是"文革"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吧。

我想了想,只好如实回答谭副总理的问题。

我说,如果现在就让江渭清书记出来主持工作,可能困难太大了。

因为在江苏,不管是"好派",还是"屁派",他们都将江渭清视为"走资派"和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,即使中央想保护江渭清,现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也通不过。

我建议,请中央领导最好再找一下江苏省两派,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决定。

谭副总理没有回答,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,既没点头,也没摇头。

后来我得知,他果然找到江苏两派征求意见。

据说,两派都强烈反对江渭清出来工作。

'两天以后,"中央文革记者站"负责人徐学增通知我,要我第二天早上准时到中南海,周总理要再次听取我的汇报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乘"中央文革记者站"的轿车来到中南海西门,看见里面开出一辆轿车,车上走下一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位穿军装的干部,要我上了他的车子。

车子开到西花厅前,工作人员请我在会客厅等候。

大约两三分钟后,周总理夹着一包卷宗,从另外一个房间进来,我向总理敬礼,总理与我热情握手, 对我说:"请坐,坐,坐。

"我们在铺着绿绒毯子的长条桌前坐下。

汇报前,周总理先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到的北京。

我回答说,是乘坐许司令派的飞机,他担心我坐火车时间长误事,亲自调飞机,整架飞机就我一个人

接着,周总理让我详细谈谈江苏省委老干部在"文革"中的表现,问我对他们印象如何,嘱咐我一定要敞开谈。

于是,我根据平时的了解和印象,向周总理汇报。

我说,陈光是书记处常务书记,也是老书记了,他人很稳健,一般不多说话;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,属于造反派"红总"观点,我感觉他有点激进;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,人忠厚老实,有时随大流,也不多说话,沉默寡言,对各派的态度不明显;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长高啸平是江苏省老干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,他反对江渭清,认为江渭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。

周总理听取我汇报期间,不时批阅秘书送进来的急件。

周总理思维极为敏锐,一边听取我的汇报,一边批示那些急件。

我记得,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乘机走到我身边耳语,还站在总理背后打手势。

于是,我尽量简明扼要,甚至停下不再说话。

但每逢如此,总理便抬起头望着我,示意我继续说下去,还详细询问许多细节,致使汇报一再拉长。 我的汇报从上午从8点多,一直延续到中午,长达四个小时。

这是我单独同周总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汇报中,周总理还问起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。

时隔数日,周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前往西花厅,这是周总理第三次听取我的汇报。

这次的召见时间不长,总理说,现在看来,江苏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,如果真有必要的话,可能在全 省军管,你从记者角度看,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合适?

面对人事问题,我感到无所适从,觉得难以回答。

但是,总理诚恳征求我的意见,我不能不回答。

我对周总理说,许司令是军事十鄙,处理复杂问题,面对造反派和群众,有时容易急躁。

我个人认为,杜平政委比较合适,他政治经验丰富,对造反派工作很有耐心,性格也很温和,善于处 理棘手问题,既能服众,又能稳定江苏局势。

"密杀令"周总理第三次召见我十多天后的一天深夜,徐学增把我从睡梦中叫起。

我来到会议室,见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里等候。

我看到,王力、戚本禹的神情与往日大不一样,会议室里弥漫着一派紧张气氛。

他俩拿出两封匿名信的影印件,严厉质问我:"这两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?

你知道不知道?

"我紧张地接过影印件,看过之后,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

原来,这两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过。

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,高啸平说,有人在江苏省公安厅的档案里,发现两封神秘信件。

信纸是老式的竖写红格宣纸,上面写着流利的毛笔字。

我记得,那封信的大意是:渭公:林彪要篡党夺权,请速派人去北京,秘见胡服(笔者注:刘少奇的别名)夫人,号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,直取北京,消灭肉体后,报告周总理。

关于这封信的来历,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,能写这封信的,在江苏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江渭清的小舅子,一个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。

当时,我们曾将上述情况写成简报,上报"中央文革记者站"。

" 密杀令 " 事件发生后,一些莫须有的传闻在南京上层不胫而走,比如:有人说,江渭清接到信后, 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,我们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没有问题,但是,林彪有没有宗派情绪不一定。

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据高啸平说,江渭清就这一事件,曾亲自复信让转给党中央。

戚本禹严厉地问我们:这么重要的事情,为什么不报告?

徐学增说,当时因为没有公安机关调查,在无法弄清真实程度之前,匆忙向中央领导反映,有些不妥

接着, 戚本禹问我: "你回北京干什么?

是谁让你回北京的?

- "我如实回答说:"是周总理让我来北京,向他和谭副总理汇报江苏夺权问题。
- "听完我的回答,戚本禹显得非常不满,既像对我,又像对王力说道:"今后,江苏的问题不要向他们汇报,江苏问题我们得接过来。
- " 听了戚本禹的话,我非常吃惊。

我第一次感到,在他们看来,中央并不是一条线、一个阵营。

既然如此,我作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员,今后到底听谁的呢?

此时,我深感政治斗争的险恶,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。

我觉得,有些事情我必须解释一下,我对王力和戚本禹说:"是总理找我们汇报的,我乘许世友司令 员派的飞机来京,到北京的活动都是'中央文革记者站'安排,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 总理和周总理的召见,'中央文革记者站'的负责人都知道。

- "我的意思很明显,我作为党员,周总理和谭副总理让我汇报情况,我必须忠实执行。
- "密杀令"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谜,直到我离开南京,也没调查清楚。

无法说明真情回答完王力和戚本禹的问题后,我回到宿舍,刚刚睡下,徐学增又把我叫醒,说:"中央文革"领导让你找到高啸平,马上赶到钓鱼台康生处,有紧急任务,越快越好。

" 中央文革记者站 " 给我派车,我乘车来到高啸平住处,按上他后,驱车来到钓鱼台康生住处。 有人引我们来到一间大会议室。

记得在场的"中央文革"领导,有陈伯达、康生,江青、王力、关锋,戚本禹等人。

###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后记

《中国》,中国冯克力1972年,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《中国》。 这部影片在国外播放不久,即遭中国方面举国批判,被斥为"反华"大毒草。

由于该片从未在中国公开放映过,所以,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安东尼奥尼到底拍了些什么。 前些时候,我在一家音像制品店里,偶然买到了安东尼奥尼的《中国》光盘,花了四个多小时,把这 部曾备受争议的影片一口气看完。

出于职业的偏好,我固然要庆幸安东尼奥尼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十分宝贵的影像资料,真实记录了三十 多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。

但更让我感到庆幸的是,中国在举国声讨安东尼奥尼之后没几年,便选择了向封闭与贫穷告别,走上 改革开放的不归路。

面对安东尼奥尼留下的那些比如隔世的影像,抚今追昔,不能不由衷地感慨:中国人到底还是幸运的

上个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,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。

世界各地的人们,在目睹地壳能量聚集爆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同时,无疑也感受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中国社会能量的一次空前聚集与爆发。

而更今世人刮目的则是,整个救灾过程的空前透明、对国外救援的开放,以及政府破天荒地为遇难的 普通民众降半旗致哀,种种举措,无不显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人类普适价值的接纳与认同。 据介绍,当年在遭到中国猛烈批判后,安东尼奥尼曾一度十分苦闷,以致连续几年不再执导任何影片

改革开放后,据说中国有关方面曾有意邀请安东尼奥尼再来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,被他婉言谢绝。 而今,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友好感情的电影大师了:此中国,已非彼《中国》

0

# <<老照片(第59辑)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